



考古新视野

于薇
著

圣物制造与中古 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文物出版社

圣物制造与中古
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于 薇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 于薇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8. 1
(考古新视野)

ISBN 978 - 7 - 5010 - 5233 - 2

I. ①圣… II. ①于… III. ①舍利—宗教文化—研究—
中国—中古 IV. ①B94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5705 号

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著 者：于 薇

责任编辑：谷 雨

装帧设计：肖 晓

责任校对：安艳娇

责任印制：梁秋卉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4.25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5233 - 2

定 价：70.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对公元5到9世纪中国佛教舍利供养活动及其遗物的专题研究。这一时期是佛教舍利信仰自中国初现并发展至顶峰的重要阶段，创造了无可比拟的物质遗存、视觉文化及宗教景观。借助于神圣的盛放容器，及沟通宗教与政治空间的舍利展示与迎送仪式，“佛陀舍利”最终于8世纪初在中国成为至高权力的象征。

以中古时期舍利供养对舍利神圣性的构建及想象为中心，本项研究综合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史、政治史等研究方法，从以下三个层面回应以往讨论。首先，在空间上，始终参照印度及中亚地区舍利供养所代表的异域传统，具体考察每个时代对其不同的回应方式，以此深入思考舍利供养的“中国化”过程；其次，在时间上，关注舍利供养活动从南北朝出现至唐代发展至顶峰这一完整过程，侧重分析各个时期舍利供养活动的联系及改变；最后，在观念层面，以舍利的“瘗藏”与“示现”为主题，尤为强调它与墓葬传统中身体观念的不同之处，即对舍利的展示、分配，迎送的隆重仪式，以及仪式背后的政治文化历史语境。

全书旨在对佛教舍利供养“中国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反思，力图呈现其在中古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原貌，揭示宗教圣物制造过程中物质与视觉媒介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实现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艺术、宗教与历史的多维度综合研究。

作者简介

于薇，1985年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本科与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2016年入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目前从事中古佛教艺术，汉唐物质文化与艺术史，亚洲艺术、宗教与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

专家推荐意见（一）

于薇本科和硕士阶段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较全面地掌握中国艺术史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而后，她进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又接受了中国历史学、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训练；在此期间，她到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学习一年，又到日本访问相关学术机构和收集资料。她的学习经历使其能够在较为宽阔的亚洲历史文化视野中观察和思考艺术史学方面的问题，具有将图像阐释、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置于当时政治和宗教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研究的自觉意识。

于薇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圣物制造：中国中古时期佛教舍利供养研究》，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富有挑战性的题目。以前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中古时期佛教舍利和舍利容器，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已经涉及诸多方面，比如舍利容器考古学上的时空资料系统的建立、形制的排比、图像的解读、舍利瘗埋制度与王权的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再对舍利容器和舍利供奉进行拓展性研究，则必须另辟蹊径。

于薇广泛收集了印度、中亚和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材料和相关历史与宗教文献，在借鉴和吸收前辈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以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舍利瘗埋制度和舍利供养活动为研究对象。她首先梳理了舍利供养方式从古代中印度传统到犍陀罗的发展过程；进而整体观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舍利供养、颁送、展示方法和仪式的演变与王朝政治的关系，讨论舍利崇拜在中国颇为复杂的本土化过程；然后试图从物质文化、图像艺术和宗教崇拜仪式等方面，还原中国中古皇权政治与宗教信仰互动过程中舍利及舍利容器作为圣物的历史情境。

于薇受到犍陀罗舍利迎送仪式和西方基督教圣物崇拜的启示，通过舍利容器之于舍利本身的“瘗藏”与“展示”这种一隐一显的供奉行为的社会性，来观察皇权和高僧如何操纵舍利容器的制造、舍利的颁送、舍利及舍利容器在宗教空间与世俗政治空间之间的移动和展示等舍利供奉行为，实现对宗教信仰权威的利用。具体而

言，她论述了舍利容器北魏和北周本土化的盝顶方函形制与南朝和东魏北齐异域风格的圆函的不同，以及关于阿育王舍利的问题。接着讨论了隋文帝仁寿年间三次颁送舍利使用盝顶方函，融合谶纬符瑞感应故事，如何通过制造宗教圣物来建构自己“普天慈父”的政治身份。并且对武则天作为皇后时施造九重金银棺椁供奉法门寺舍利以及作为皇帝时供奉法门寺舍利于东都明堂与九鼎并置的史实进行分析，试图阐释超越民族的佛教圣物崇拜与儒家世俗最高政治权力的象征物如何在特殊的历史情境相互借力。她还讨论了从唐肃宗至唐懿宗时期制度化的定期迎奉舍利至长安宫内和诸寺供养与示众的历史状况，阐述了在长安都城空间内佛寺与皇宫之间因舍利的移动所产生的联系，以及在当时皇室、高僧、信众和佛教圣物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皇权如何借助宗教信仰进行建构和运作的历史景观。

关于隋唐时期舍利容器上的装饰图像，特别是法门寺舍利容器上的图像，此前学者们已有相当多的阐释，但是于薇发现学界过去对8世纪初的蓝田舍利石函和晚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上的图像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她通过将当时民间广为流行的佛教类书《经律异相》和观佛经典《观佛三昧海经》与蓝田舍利石函图像进行比对，来阐释此舍利函上看起来十分特殊的涅槃故事图像程序，发现其中蕴含着佛陀三身观念。她对“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盖中央场景中的榜题“将来”二字的解释，则更加符合佛教圣物传播的历史语境，进一步证明此六瓣银盒与其组合的海棠形银盒和龟背形银盒实为一套三重舍利容器。她对这两套舍利容器上的图像内涵的解释应该说是独到而有说服力的。

于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佛教舍利容器和舍利供养行为若干问题的探索和阐释，有助于深化对中古佛教与皇权之间的历史境况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佛教舍利崇拜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特此推荐。

李星明

2016年9月16日

专家推荐意见（二）

分合、交织与还原：人文学的新希望。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指政治权力的运作模式。如果借用罗贯中的智慧，反观学术界的发展，却有其不谋而合之处。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已经荡然无存。历史不但离开文学和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历史学本身还衍生更专业的分支，例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科技史、思想史、宗教史……。此外，艺术史学和考古学——两门 19 世纪兴起的新学科——也加入历史学，成为研究人类过往的专业领域。考古学强调挖掘、整理和分析古代物质遗存，于 20 世纪初引进中国后，和历史学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艺术史学旨在研究发掘或传世的艺术作品，和以古代文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在欧美大学里并列为文学院的两门核心学科，各有其系所，和在中国或栖息于美术院校、或缺席于综合大学的处境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学术的专业分工，固有其深入与精到之处，却不免有见树不见林之虞。于是“科际整合”的呼声四起，跨学科研究俨然成为进入 21 世纪后的重要学术潮流。

只有明了学界分合的态势，才能真正理解于薇研究中国中古时期佛教舍利供养的价值与贡献。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舍利供养不单纯只是历史现象，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佛教盛行之地，仍然普遍存在。舍利供养遂成为多方关注的议题，深感兴趣并加入讨论者往往不限于学界中人。其次必须指出的是，学术的专业分工，对此一议题的厘清与深化，的确功不可没。宗教史学者爬梳历史文献和佛教经典，阐明舍利供养的梗概和来龙去脉；考古学者在挖掘古代墓葬和佛教遗址过程中，发现舍利和盛装舍利的遗物，提供全新的研究材料；考古学者和艺术史学者对舍利容器的器型和装饰纹样，透过类型学和图像学的分析，探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佛教经典的应用。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舍利供养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活动，僧侣集团和艺匠集团固

然是两股重要的助长力量，若无其他社会成员的推波助澜，舍利供养也难以成其巅峰。换言之，舍利供养所牵涉的复杂层面，需要借助跨学科研究的宏观视野来解析。

于薇的博士论文从帝王作为舍利供养人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追索阿育王分舍利的故事从印度到中国传衍的经过和转折，一方面观察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诸帝王对阿育王分舍利故事或仿效、或区别的不同反应，以论证中古帝王在挪用舍利作为巩固政权工具的曲折过程当中，也将舍利汉化，纳入中国政治正统论述的语汇里。文中对隋文帝作为“普天慈父”于仁寿年间颁送舍利的举措，以及武则天于显庆和长安年间奉迎舍利至宫廷和明堂的活动，均有精辟的析述。顺着帝王为何与如何供养舍利的思路，于薇对舍利容器的材质、形制、铭文和图像装饰进行综合考察，也多有新见，特别是舍利容器风格的异同与发展，实与政权的相互竞争和自我表述关系深深。例如北魏时期发展出以盝顶方函为特征的“中国化”的舍利容器，分裂之后为据地西土的北周所继承，却为据地东土的北齐所排拒，北齐采用具有异域风格的圆函；又如隋初袭用流行于北齐的圆函，仁寿年间因有意和外来的阿育王传统有所区隔，遂改用流行于北魏北周的盝顶方函；再如唐代装饰于舍利容器器表的分舍利图像，并列帝王和婆罗门为中轴对称构图的双中心，不见于印度或中亚的图像传统，系为唐代艺匠对当时将舍利供养纳入王权建构的论述的视觉传译；而武则天施造九重舍利容器，并曾迎置明堂，和九鼎共陈，其政治寓意更不在话下。此外，于薇也注意到帝王介入之后，对舍利供养的影响，从而梳理出由隐性的舍利瘗埋到显性的舍利展示的变化与进展，亦属创见。文中以文献记载的奉迎仪式为蓝本，结合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详究舍利在城市空间、宗教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动态游行，有唐一代供养舍利的空前盛况，遂跃然纸上。

于薇的博士论文不但对舍利供养的专题做出贡献，更为人文学提供跨学科研究的新希望。就学术的专业分工而言，来自艺术史、考古、宗教史和政治史诸学界的读者，既可在本论文中追查熟悉的议题如何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并能在检视论证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原本不熟悉的面向。政治史工作者将发现稍纵即逝的仪式和可见可触的物品（舍利以及为供养舍利而产生的建筑或容器）在正统论述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宗教史工作者将意识到经典的局限性，圣物可以在尘世里不断地被制造和诠释，僧侣、供养人和艺匠的互动也经常形塑不见于经典的宗教风潮；考古工作者

将体会到遗物的风格，有其外于材质和形制的复杂性，也有其不依类型和不循线性发展的交缠地带；艺术史工作者亦将面临挑战，不得不重新思考宗教图像和经典依据、艺匠和赞助者、文化传递和族群时空等关系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脉络里开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条分缕析之后，并不落入分类的窠臼，而是将各种线索和证据交织呈现，最后终能以生动而具说服力的方式还原舍利供养所处的历史情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成学的经过和向学的精神，也颇值借镜。于薇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攻读博士，并受到教育部的奖助，至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访学一年。无巧不成书，这两所机构不约而同地都成立于 2007 年，也不约而同地都以推动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学研究为职志。于薇躬逢其盛，于耳濡目染之际，推陈出新，实令人欣慰。而于薇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尽其所能地搜集中外图书资料，尽其所能地访查中日遗址和公私收藏，并尽其所能地在各种思辨挑战中不断重整思绪，其所展现的热诚和坚毅，也令人对年轻学子如长江后浪般的无穷潜力寄予厚望。

曾蓝莹

序于丁酉立冬日

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

目 录



001 绪论

001 (一)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003 (二) 学术史及主要问题

013 (三) 选题意义及方法

014 (四) 篇章结构

017 一 从印度到中国的舍利供养与舍利容器

017 (一) 公元前2到公元1世纪印度地区舍利容器

024 (二) 公元1到5世纪犍陀罗地区舍利容器

041 (三) 唐之前中国舍利容器中的“舶来品”风格：以弦纹带
盖圆盒为例

056 小结

059 二 圆函或方函：南北朝时期的舍利容器与瘗埋规制

059 (一) 北魏北周舍利容器的形制与瘗埋规制

069 (二) 北齐舍利容器的形制与舍利瘗埋

075 (三) 舍利之争：南北朝时期阿育王塔的“被发现”

082 小结

084 三 圣物制造：隋文帝仁寿年间舍利颁送活动

084 (一) 盂顶方函与“样”

095 (二) 隋代佛教舍利的转移与集中

105 (三) 仁寿年间舍利的来源与分配

116 小结

119 四 建构权威：隋唐时期舍利容器的铭文与装饰图像

120 (一) 舍利塔铭的分布及形制特征

126 (二) 唐代舍利石函装饰与涅槃故事情节——以蓝田出土舍利石函为中心

141 (三) 唐代分舍利图像研究

161 小结

162 五 唐代两都佛教舍利的展示与迎送活动

163 (一) 唐长安城的圣物展示活动

170 (二) “陈其供”：九鼎、真身舍利与明堂

178 小结

179 结论 何为舍利？

179 (一) 跨文化视野中的佛教舍利及舍利容器

180 (二) 亚洲史背景下舍利崇拜的“中国化”

182 (三) 文本、图像与仪式中的舍利

183 (四) 中古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舍利

185 参考文献

195 附表1 纪年北朝、隋、唐舍利容器

201 附表2 无纪年隋、唐舍利容器

203 附表3 佛典所记载“分舍利”情节

插
图
目
录

- 图 1.1 Vedisā 城周围佛塔及佛教遗迹分布图 21
图 1.2 Sānchī 2 号塔立面图 22
图 1.3 Sānchī 2 号塔覆钵体石盒内的四件舍利容器 22
图 1.4 Sonārī 1 号塔覆钵体内石盒剖面图 24
图 1.5 塔克西拉地区古城及佛寺分布图 26
图 1.6 健陀罗地区浮雕石板祠堂形窣堵坡 28
图 1.7 Mohenjo – daro 遗址平面图 29
图 1.8 达摩拉吉卡佛寺遗迹平面图 32
图 1.9 健陀罗浮雕石板 34
图 1.10 窑堵坡形舍利容器 36
图 1.11 达摩拉吉卡遗址佛塔出土舍利容器 37
图 1.12 Tilya Tepe 墓葬群出土香盒与健陀罗地区舍利容器对比 38
图 1.13 迦腻色伽舍利容器 39
图 1.14 比马兰舍利容器 40
图 1.15 弦纹带盖深腹圆盒 43
图 1.16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中印度地区弦纹装饰舍利容器 44
图 1.17 公元 3 ~ 5 世纪健陀罗地区锥纽带盖弦纹装饰深腹圆盒 45
图 1.18 公元 7 世纪左右丝绸之路北道库车地区出土木质舍利容器 46
图 1.19 北齐武平三年马仕悦造像碑及局部 49

图 1.20 张盛墓白瓷盒与静志寺地宫隋代弦纹舍利铜盒对比	50
图 1.21 南北朝—隋 舍利容器	51
图 1.22 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的三件隋代白石材质舍利容器	56
图 2.1 河北定州塔基出土物	61
图 2.2 北魏兴安二年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石函开龛及左侧面图	66
图 2.3 甘肃平凉泾川出土石函	67
图 2.4 河南安阳修定寺石塔塔基出土舍利石函及底座铭文拓片	70
图 2.5 公元 3 世纪 新疆约特干出土陶制贴塑舍利罐	72
图 2.6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2 号天宫出土瓷制舍利罐	73
图 2.7 公元 6 世纪青瓷有胆莲花尊	73
图 2.8 隋开皇九年（589 年）陕西西安隋清禅寺砖室出土绿釉四耳瓷罐与褐釉瓷瓶	74
图 2.9 四川成都地区出土南朝背屏造像中的宝塔纹	78
图 2.10 青州地区宝塔纹	78
图 3.1 隋大兴城清禅寺出土舍利瘗埋遗物	87
图 3.2 绿釉四耳瓷罐	88
图 3.3 陕西耀州神德寺出土仁寿四年瘗埋舍利遗物	91
图 3.4 越南北部出土隋仁寿元年瘗埋舍利遗物	92
图 3.5 黑陶钵	102
图 3.6 黑釉瓷钵	103
图 3.7 佛塔地宫出土小型钵	104
图 3.8 中亚地区佛钵信仰图像	105
图 4.1 北齐及隋皇帝供养舍利刻铭	122
图 4.2 蓝田舍利石函整体及四面函体减地浮雕	128
图 4.3 中亚地区迎送舍利场景与敦煌地区行棺图之比较	131
图 4.4 婆陀罗地区浮雕石板之上“五百力士移石”场景与蓝田舍利石函场景对比	133
图 4.5 争分舍利图	134

- 图 4.6 敦煌莫高窟第 72 窟南壁细部 135
- 图 4.7 婆陀罗地区浮雕石板及库车地区石窟壁画中分舍利场景 136
- 图 4.8 公元 8 世纪中国所见“分舍利”场景 144
- 图 4.9 山西临猗大云寺涅槃变相碑及局部 145
- 图 4.10 客使图 147
- 图 4.11 胡人像 148
- 图 4.12 克孜尔石窟第 224 窟手捧舍利的婆罗门形象 149
- 图 4.13 敦煌莫高窟北朝窟婆薮仙与 8 世纪长安地区舍利石函之上香姓婆罗门
形象对比 151
- 图 4.14 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155
- 图 4.15 朝阳北塔地宫出土经幢第四层“八国诸王分舍利”图 156
- 图 4.16 “都管七箇国”银盒套层舍利容器 158
- 图 4.17 “都管七箇国”银盒及细部 159
- 图 5.1 圆仁记录会昌元年（841 年）二月至四月长安城佛牙供养会分布图 167
- 图 5.2 陕西扶风法门寺佛塔地宫后室密龛出土水晶椁 173

绪论

(一)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7世纪末，在唐代上下广而布之的《大云经疏》中，有一段偈颂引自5世纪初北凉昙无谶所译《善德婆罗门求舍利记》：

假使恒河中，驶流生莲花，拘枳罗鸟白，舍利乃可得。
假使龟生毛，任作僧伽梨，冬日能消冰，舍利乃可得。
假使蚊子脚，堪任作桥梁，能度一切众，舍利乃可得。
假使水中蛭，忽然生白齿，大如香象牙，舍利乃可得。
假使兔生角，堪任作梯橙，高至净居天，舍利乃可得。
假使鼠虫等，缘于兔角梯，在上而食月，舍利乃可得。
假使蝇能饮，钟石淳好酒，迷荒而耽醉，舍利乃可得。
假使驴口唇，形如频婆果，善能歌咏舞，舍利乃可得。
假使鸟角鵠，同共一树栖，饮食不相离，舍利乃可得。
假使棘刺叶，周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上，舍利乃可得。
假使小舟船，能载须弥山，度于大海水，舍利乃可得。
.....①

① [北凉] 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经》，《大正藏》第12册，No. 387，第1096~1097页。

这段偈颂描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诡论。与其说它在讲述舍利的稀得与难求，不如说它反映了附加在舍利之上无法遏制的想象力：以蚊脚为桥梁摆渡一切众生，虫鼠以免角为梯登而食月，载负须弥山的片舟浮游大海之中。此类不可思议的场景，借由颇具形象及视觉化的描述，作用于人们对舍利的无限想象。这正是本项研究的主题：中古时期的舍利供养如何利用视觉及物质的手段构建或想象舍利。换言之，以舍利为中心的物质文化、视觉图像与宗教仪式如何在5到9世纪中国境内愈演愈烈的舍利崇拜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1. 舍利与舍利容器

“芥子许”是佛经中描述舍利物质形态的常用词汇。芥子，是一种植物的种子，形如粟粒，十分微小。佛典中芥子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个更宏大的事物，“芥子纳须弥”正是这种对比的体现。舍利供养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依照佛经所示，供养极其微小的舍利便可以带来无量的福报。从目前出土情况看，佛教舍利多为零碎的沙石、灰烬抑或结晶体，从形象上说，这些形如芥子的舍利，不仅极其微小，且不易察觉。然而，大多数盛放舍利的容器却极尽华丽繁复，以此提示其内容比形式更加重要。可以说，舍利的存在，是由舍利容器及其周围作为供奉物的“七宝”所共同证明。

舍利几乎无法脱离容器单独存在。在功能上，舍利容器不仅仅作为盛放之用，更是构建舍利神圣性的重要媒介，舍利容器的形制、装饰图像及组合方式，都以不同方式在其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观念上，舍利容器成为两个概念“藏”与“现”的合成体，一方面，它需要盛放已经不可见的佛陀肉体，另一方面，又需要彰显及证明其内舍利法身的神圣性。因而，从历史来看，舍利容器逐渐成为舍利供养活动的主要对象。

公元前2世纪，中印度地区出现最早的佛教舍利容器，虽多为石质，但以选择成色丰富、质感光滑及坚硬度高的石材作为虔诚信仰的证明；公元1世纪末，犍陀罗地区的贵霜帝国王室及贵族开始将大量奢侈品黄金、宝石、珠玉作为舍利容器的材质、装饰及舍利供奉品。公元3世纪，中国开始出现佛教舍利供养活动，公元5世纪已出现石、铜及琉璃材质的舍利容器。

自公元5到9世纪，中国境内不断上演愈加高涨的舍利崇拜活动，有唐一代对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骨舍利的供奉将中国舍利供养活动推向顶峰。公元660年，唐高宗